

七载低迷

得益于各国政府有力的应对政策，全球经济正从失业率高峰中缓慢复苏

普拉卡什·洛嘉尼

2007年，经济大衰退的爆发导致全球失业率攀升，达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10年，全球新增失业人口已达3000万，其中约有3/4出现在高收入经济体中。

过去曾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冲击的新兴市场及低收入国家这一次却显得更具活力。新兴市场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2010年仅增长了0.25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则出现了下降。

自2010年起，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这种复苏并不均衡。目前全球失业率已恢复至2007年经济衰退前的水平，约为5.5%。2010年，高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上升至8.5%，随后缓慢回落至目前的7.5%（见图1，左图）。去年，美国的就业增长较快，但欧元区则相对停滞，该地区是造成全球就业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见图1，右图）。

“结构派与周期派”

2009—2011年间，《斯莱特》（Slate）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有“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就高失业率的原因展开了辩论”。

阵营之一的“周期派”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造成失业率走高的原因不只是一个，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周期派带头人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写道：“为什么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增长疲软——句号，不必多说，这就是全部原因。”该阵营认为，增长乏力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政府应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促进需求增长。

另一阵营的“结构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高企的原因不仅在于增长乏力，还在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量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在失业率不断增加的同时岗位空缺也越来越多。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瓦伊拉亚纳·柯薛拉柯塔（Narayana Kocherlakota）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了这种错配：

“企业中有职位空缺，却找不到适合的人才。求职者想要工作，却无法找到适合的职位。错配的潜在



原因有很多——地理、技能和人口……目前很难发现联邦政府能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把建筑工作者转型为制造业工作者。”

谁赢谁输？

四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哪一个阵营的观点是正确的呢？大量迹象显示，周期派的解释更占优势，就连柯薛拉柯塔自己也已承认了这一点。

多方面的衡量结果显示，这种错配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以美国为例，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的错配在大衰退的最初几年呈增长趋势，在部分经济部门中表现为职位空缺的增加，在另一些部门则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但随后这种错配开始下降。

错配的另一衡量手段是全美各地失业率的离差。2009—2010年间，失业率离差也出现了增长，这说明一些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州。但此后这种离差下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见图2）。劳动力参与度能否恢复，仍有待观察。

其他国家的错配迹象较不明确，但各方已达成共识，认为周期性因素是造成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

这些迹象还证实了结构主义阵营的预测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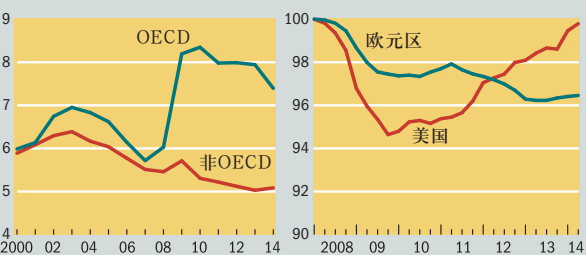
图1

乏力与增长

全球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速复苏。

（平均失业率，百分比）

（就业率，2008年=100）



资料来源：《国际就业报告》，IMF—经济学人智库—OCP政策中心，2015年1月。



结构主义者认为仅靠经济增长的恢复并不能降低失业率。在大衰退期间，工作机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依然非常紧密，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内，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见图3，左图）。该图显示了四组经济体中就业与经济增长间关联的强度，大衰退期间这种强度仍保持基本不变。

个别国家的经验也肯定了这种大趋势。例如，经济大衰退后，西班牙的失业动态可以通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间的历史关系进行预测（见图3，右图）。

政府帮忙了吗？

值得肯定的是，2008—2009年间大部分国家都作出了强有力的政策响应，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对失业的影响。首先，政府快速作出反应，出台货币政策，降低官方（“政策性”）利率，且多数政府出手对金融机构进行纾困，以此刺激产品和服务需求——进而刺激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各国政府还提供了财政刺激，其中部分通过20国集团成员国进行协调，20国集团是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

德国等国家还尝试用工作分担代替解雇，以分担需求不足带来的痛苦。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延长了失业补贴的期限。这些措施降低了失业的社会成本，而且显然不会影响失业者求职的信心。

周期派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失业率的升高，这些措施杜绝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遭遇的那种严重的经济后果再次上演。据如今掌握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那些恐惧只是夸大其词，但在当时我们并不具备这些经验。面对这次大衰退，各国政府迅速作出了有力的初步政策响应，它们应该为此得到赞扬。

转折点

2010年年中，一些政府开始关注公共债务的构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因经济衰退和对财政部门进行纾困而造成的税收收入下降——并开始着手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见专栏）。

各国在收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宽了货币政策。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伊万斯（Charles Evans）在2011年9月为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充分阐明了理由：

“想像一下，如果通胀率达到5%，而我们的预期目标是2%……那么任何一个称职的央行行长都会像火烧眉毛一样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积极性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如果5%的通胀率就能让我们产生紧迫感，那就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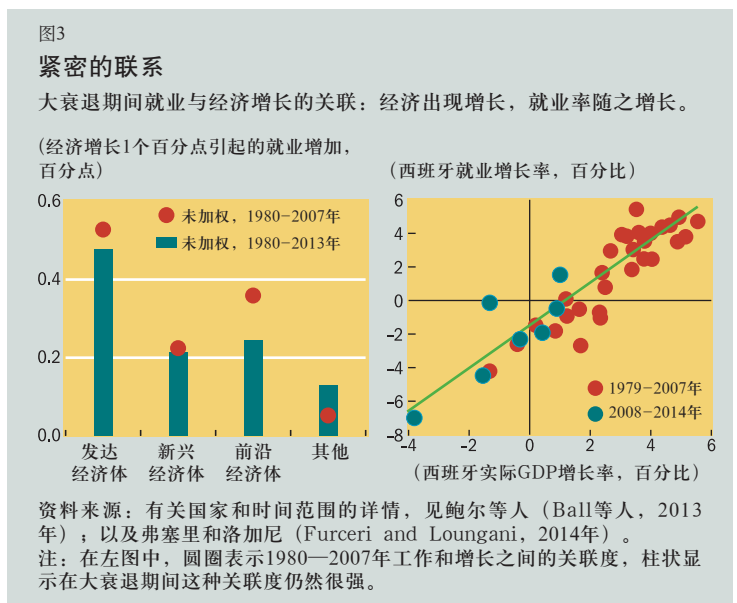
用说9%的失业率了。”

他的这番话最终导致了所谓的伊万斯规则的诞生，即2012年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作出的明确承诺——“只要失业率仍在6.5%以上”且达到通胀目标，就将政策性利率保持在基本为零的水平。同年，欧洲中央银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基（Mario Draghi）也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

未来会怎样？

欧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希腊和西班牙的高失业率尤其令人担忧——预计2015年这种状况不会出现明显改善（见图4，左图）。长期失业率继续走高——甚至在英美这种整体失业率已出现下降的国家中也是如此——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则被高青年失业率所困扰（见图4，右图）。

在IMF的一项研究中，有证据显示50%—70%的



青年失业增长应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乏力。因此，该项研究建议：“政策重点应放在推动欧元区总需求的增长上，尤其应该采取包容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让其对必要的结构改革的实施形成补充。”（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欧洲失业问题”）。

令人振奋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已执行多项措施来支持这些需求：2015年1月，该银行声明将进一步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该银行已采取措施，拟通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运输、通信和能源网络的跨国投资推进经济的增长。

这些刺激需求的措施越来越多地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以应对大衰退之前的经济疲软。除了采取措施逐步建立银行联盟，鼓励信贷流动之外，国家层面的改革也得以推行，如开放产品和服务市场（如能源市场），以减轻监管负担、深化资本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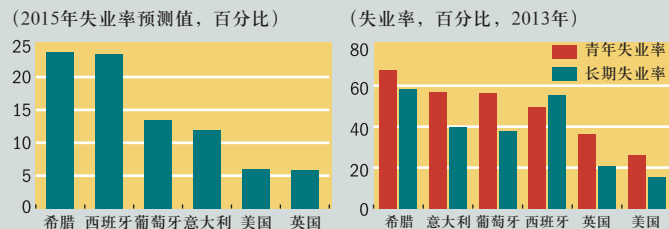
各国也在努力解决二元制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这些市场上，有的工作者拥有长期合同，享受充分的就业保障，而另一些工作者，往往是年轻人，他们以临时工合同的形式受雇，几乎得不到保障或培训机会。以意大利为例，该国目前已通过法律批准一种新的劳动合同类型，此类合同提供的就业保障会随职位任期的增长而逐渐增加，应该能够促使雇主积极尝试雇佣较年轻的求职者。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有迹象显示，长期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应远不及总失业率对经济的回应。因此，可

图4

前景堪忧

青年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预计将持续走高，令人担忧。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更新，2015年1月。

注：失业持续期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称为长期失业。

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为长期失业人口提供帮助。卡茨 (Katz) 等人 (2014年) 建议，在经济衰退最严重时，政府应重点为长期失业人口提供失业救济和培训，而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收紧，政府应转而更主动地实施求职协助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长期失业人口可能会面临找到工作却难以保住工作的问题，对于这类情况，有迹象显示财政激励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

失业的成本非常高昂。许多失业人口面临着持续的收入丧失和健康问题，即便找到工作，这种情况也不会马上得到改善，他们的家庭深受伤害，社会凝聚力也遭到破坏。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如政府没能快速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遏制失业增长，失业率——及相关成本——会更加令人难以承受。要拉低欧元区的高失业率，需要通过能在最大限度上驱动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续提供支持。■

普拉卡什·洛嘉尼 (Prakash Loungani) 是IMF研究部顾问、IMF就业和增长项目负责人。

IMF的财政整顿观

2010年政策制定者一反以往，削减了与危机有关的支出，这个财政政策得到了IMF的支持——但这并非因为其支持“扩张性紧缩”，“扩张性紧缩”观点认为财政整顿在某些情况下有益于经济增长。相反，IMF的内部研究表明：

- 财政整顿将造成经济萎缩——即，财政整顿会降低产出，导致失业率上升；此外，IMF还对其员工是否使用正确的“财政乘数”进行了调查（即对财政整顿的紧缩作用的测量是否正确）；

- 以往的财政整顿加剧了发达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见“一剂苦药”，《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

- 在以往的经济复苏期间，财政和货币政策均向同一方向推进，共同支持经济复苏。

依据这些结果，IMF提醒各方不要过早削减财政刺激，这可能会导致刚刚萌芽的经济复苏脱轨，并建议除紧急融资制约外，采取温和、慎重的退出机制是唯一办法。IMF在设计计划时考虑了这种整顿对贫困人口的影响，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对这项决策表示了支持。鉴于201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她表示，实施谨慎的经济整顿“是一项正确的号召”。

参考文献：

- Ball, Laurence, Davide Furceri, Daniel Leigh,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3, “Does One Law Fit All?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Okun’s Law,” *New School talk*, September 10.
- Draghi, Mario, 2012,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Global Investment Conference, London, July 26.*
- Evans, Charles, 2011, “The Fed’s Dual Mandate: 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U.S. Monetary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European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Cent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September 7.*
- Furceri, Davide,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4, “Growth: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ure for Unemployment,” *iMFDirect blog*, November 19.
- Katz, Lawrence F, Kory Kroft, Fabian Lange, and Matthew Notowidigdo, 2014, “Addressing Long-Term Unemploy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Recession,” *Vox*, December 3.
- Kocerlakota, Narayana, 2010, “Inside the FOMC,” *speech delivered in Marquette, Michigan, August 17.*
- Krugman, Paul, 2011, “The Fatalist Temptation,” *New York Times blog*, July 9.
- Ledbetter, James, 2010, “Strucs vs. Cyscs,” *Slate*, August 24.